我们成长的年代

王宏甲

世世代代，我们都崇信：天下财富均源于实物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良知良能。19世纪中国被西方工业的炮火打进血泊，中国若无工业，何以自强？从那时起，发展新兴的生产力，便成为贯穿几代人奋斗的基础的东西，思想、观念、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都在剧烈的动荡中经历着变迁。

第一次发展工业始于洋务运动，此后在列强发动的一次次入侵战争中，中国屡遭劫难，工业未能长足发展。第二次就是共和国诞生后大规模发展工业。

共和国诞生之初，中国的钢铁产量如分配到国人手里，每人平均只有半斤，刚够打一把菜刀。新中国成立刚好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更广阔的行动是：在大小城镇和乡村办起了那么多扫盲班，夜校里夫妻学文化，老汉老太学文化，处处明亮起学文化的灯光。

到了我去插队的岁月，我知道了大队会计就是“在那时扫了盲”。我们村最高的那个地点叫“钟顶”，我感到这地名怪怪的，问起来才得知，这地方在清代曾有一座西方传教士来此建的教堂，教堂是尖顶的，教堂里还有一口大钟，村民就把这个地点叫钟顶。后来，洋教士消失了，教堂里被塑进了菩萨。菩萨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那口大钟则早在大炼钢铁那年被砸碎填了高炉。

我由此得知，那时候“兄弟炉”、“父子炉”、“夫妻炉”……也曾雨后春笋般在这么偏僻的乡村里奇耸于天野之间。若干年后有关成败得失的讨论我们都不陌生。总结了经验，我们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以这么大的决心去发展工业。我国凝聚起很少的科技人才，集中起有限的资金，在内外交困中尽一切努力去发展工业，那是生产出一个脸盆一支牙刷就能给遥远的山村带去欣喜的岁月，社会主义把现代生活的气息相当平等地带到了中国的一切穷乡僻壤。

中国知识界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去创建空白学科和尖端学科，在开创和发展我国的概率论、空气动力学、原子光谱学、分子光谱学、固体物理、高分子化学、有机合成、植物生理、生物化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三次更大规模地发展新兴的生产力，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就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20世纪，机器改变了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但要认识一个齿轮同市民的关系，并不容易。共和国前30年顽强地发展起来的生产经营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封闭体系，没有完成同世界接轨。这个时期中国的困境非常严峻。我的同代人经历了插队后终于走进工厂，不久又经历了下岗，女工首先被“劝说”回家。许多人已经上有老下有小，这是很尴尬很累的一代。许多人也怨也骂，但是不能接受我们自幼长大的岁月是一片黯淡的说法。很多情况下，我们带着尴尬的笑容默默地捍卫着自己成长的岁月。

我们曾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渴望建设一个工业时代的新世界。现在计算机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正把传统的工业时代变成了旧世界。巨大的困境在于：我国面临着非常艰巨的双重转型。一是我国有大量亟待改造的传统型工业，还有规模巨大的18世纪的手工农业，必须向信息时代的新经济转型；二是必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王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一个科学家去攀登产业和市场的艰辛历程。陈春先第一个倡导在中关村建“中国硅谷”，致力于把高技术“扩散到民间企业中去”。王选和陈春先的艰辛历程是如此壮丽地开启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科研和生产力发展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已经不在于哪一项科技发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直接登上产业和市场的舞台，成为新兴的先进生产力代表。

如果说北京中关村的高技术企业代表着我国的“精英经济”，那些在中国乡村创办民营企业的农民自称是搞“草民经济”。我看到了，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打开了老百姓自主创造财富的广阔空间，是老百姓经济。由于能够自主，他们就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困境中同贫穷进行了壮烈的搏斗。因而我相信这样的说法，中国改革开放，从最根本最现实的意义来说，是中国空前的反贫困事业。由于十数亿人的奋起，这是20世纪人类反贫困事业中最波澜壮阔的一部分。他们就在计算机已经在改变世界的年月，从创办传统型工业发端，接着就向凝聚着高技术的研发制造挺进，终于令人不可思议地把经济做到了五湖四海。

“让英国佬替我们生产吧！”这是帝国时代的西班牙人的声音。由于哥伦布的发现，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个去开发美洲大陆的国家，并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西方第一个跨越洲际的帝国，当时西方最富强的国家。但西班牙热衷于海外扩张，许多商品依赖英国人生产。西班牙把从新大陆运回的黄金白银付给英国人1/5，用来购买各种物品，这就培育了英国的工业。英国的成功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是建设本国制造业和商业完整的经济体系，才有利于生存和发展；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要靠有生气和进取精神的民间投资者和工业产品制造商以及规模宏大的产业工人。

再看当今中国。欧美投资者多因看上中国民营企业的“低价劳动力”，亦如从前西班牙人说“让英国佬替我们生产吧”，现在他们也说“让中国人替我们生产吧”。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中国民营企业科技含量不高，但在替欧美厂家生产的过程中，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这使生产水平得到快速提升；二是中国人还穷，有点薄利就干，欧美投资者作为买方，便用资金培育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制造能力。中国民营企业由此把“生产力落后”和“贫穷”这两个弱势转化成优势。

我坚信，在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进步是人的进步。中国有巨大的农业人口，当大量农民变成工业生产者，不仅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并呼唤和促进了宾馆、餐馆、物流、文化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兴起。当他们能使产品被欧美市场接受，他们便以不到30年时间走了西方工业200多年的历程，由此发生和仍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不论怎么看都是奇迹！

由此发生变化的不仅是沿海农村，一座座新兴的城市脱颖而出，大中城市也迅速长大，这样的地方不仅接纳了许多外来打工者，当地农民也成为新“移民”。许许多多人都在体验：我们在迁徙，哪里是家乡？孩子也在体验，我们的父母来到这里，把希望播种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新的家乡。

这是一个颠沛再造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如此的迁徙，那种身心的迁徙，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的迁徙，思维方式、眼界胸怀的迁徙，我们从传统的农业时代迁徙到了百业交融、鲜花也成为产品的多姿多彩的时代。

世界毕竟在我们这一代被如此广阔地打开了。今天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中国的外向型企业首先遭遇困境。尽管如此，中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被世界认为是抗危机能力最强的国家，就因为我们在广袤的国土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生产和市场体系。

中国作为占世界1/5人口的国家，无论在发展三大产业方面，还是与世界各国相处，都能坚持走共建和谐世界之路，那对人类的贡献将是非常巨大的。

回首共和国诞生之初曾是怎样的穷困，我们成长的年代，身上贯通共和国成长的血脉。我们跋涉农业，攀登工业，跨进信息时代，世界好似把一段各种模样的历史浓缩了赐予我们。一路走来，即使今天也还有种种不公不平的事物令人忧心，即使“三农”问题也还深为国人忧虑与关心，但我们已能从上述发展进步中看到，我们这个拥有最广大农业人口的国家，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特别是那些从农村中踏破贫穷，冲出低谷，在三大产业中均有不凡建树的业绩，已然是十年二十年前，最有想象力的人们难以料及的气象。

没有危难，焉有生机，这大约是汉语“危机”的含义。困境还是有的，危机也是有的，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故乡那条河

梅洁

在鄂西北那座具有3000年古老文明的小城脚下，有一条大河——汉水。

我在河边长大。15岁时我离开故乡，也告别了那条古老的大河。此后几十年里，我从南方到北方，从京城到大漠……故乡的大河居然如父母迷蒙的泪光，永远深深地灼痛着我的乡恋。

长达半个世纪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改变了汉水的命运。工程就是引这条江的水解救中原、华北、北京和天津的水危机。

1991年，离别汉水31年后，我踏上故乡的土地，当我和江岸边一群男娃女娃围着一盆烧得很旺的炭火——听他们诉说汉水命运中的大坝，说那年小城被大水淹没的故事；然后我们一起走向江岸，凭水而立，默默地凝望大河流向大海的风景；然后我们相互望着，许久之后，我们拉起手，向身后那片山地走去……

就在那一年我终于弄明白，我的故乡因为有了那条古老的大河而诞生和演绎了3000年的文明；也因为有了那条美丽的大河，1958年开建的、为北方人输水的162米高的水坝已巍巍矗立在江中，诞生我的古城也沉没在江下。深深的忧伤与颤栗使我最终完成了《山苍苍，水茫茫》的长篇报告。当这篇报告落笔之时，我发现，对于汉水的虔诚与膜拜已成为我的宗教。

2005年当我再度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才得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停建、论证了十几年后又全面开工。矗立在汉水中的162米高的大坝将加高到176.6米，丹江口水库蓄水量将由170亿吨增加到290亿吨。2014年后将每年向中原、华北、京、津输送95亿吨生命用水，2030年后将每年向这些地区输送安全用水140亿吨。

为此，我无数次默默地希冀：2014年，当清澈的汉水给干渴的中原、华北和京津大地带来一片滋润时，当人们欣喜地端起从遥远的鄂西北流来的一杯幽蓝时，不要忘记为此而两度奉献了家园和土地的库区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几代人在半个世纪里经受的磨难和牺牲。

或许那时，他们正在高高的山顶，围着一堆篝火，轻轻地哼着一支人类从蛮荒走出来时的歌——“举起火把，让我们走出山谷！”或许，他们正站在江岸，凭水而立，默默地凝望葬在水下的日子，然后望着北方的天空吟唱：“你本是天上的银汉啊，我的汉水……”

我想，那歌声一定很哀怨，也很悲壮……

汉水北上进京后，直接供水范围3200余平方公里，包括北京城区、大兴、通州全部以及房山、门头沟的山前平原和沙河镇地区。通过与当地水联合调度，供水范围可扩大到5870余平方公里，覆盖北京平原区面积的90%。

北京南水北调办的白咸勇先生告诉我，中线北京段西四环暗涵工程已全面开工，工程将穿越五棵松地铁站，在深达二十米的地铁站下面、在四环路立交桥桩基中间进行。暗涵工程头顶车水马龙的西四环路和每天运送10余万人的一线地铁，还有盘旋叠立的立交桥和耸入云天的高楼大厦，施工难度世界罕见。全长近13公里的工程挖掘不能使用任何机械，只能靠几十个工人和武警战士每天三班倒地钻在几十米深的地下，小心翼翼地、一镐一铲地进行，一班八小时的进度只有半米。

某天，我在西四环桥旁边，突然发现有一块用蓝色塑料布围拢的栅栏，蓝色围布上别着硕大的白字红布标语“南水北调，精心施工”。我顿时在栅栏外站了下来，发现里面在施工。或者说，我是一眼看见了那条鲜亮醒目的标语才停了下来的。我停下来是因为情不自禁，我知道这下面在进行着什么。

然而，眼前是车轮滚滚、人流滔滔，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奔向自己的目的地。于是，我独自站在栅栏外呆想：在这个千万人的大都市里，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地底下正在悄静而紧张地进行的工程？有多少人知道南水北调真正的含义？有多少人知道调水源头在哪里？又有多少人会感动不久就要喝上三千里迢迢北上的汉江水？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北京市水利局局长焦志忠告诉湖北记者的一段话：“中线到达团城湖终点之前，设计了一段800米明渠，这是汉水进入北京80公里后第一次露面。”他还说：“南水北调是伟大的世纪工程，多少人为之奋斗和奉献。我们设计一段明渠，就是要让北京市民能够看见，千里迢迢调到北京的水是什么样子，饮水思源，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又说：“北京之所以不惜代价，用管涵引入汉江水，在北京建设一条80多公里的地下暗河，主要是出于保护水质考虑，使其免遭污染。湖北等地水源区的人民，为北京保护了这么一盆好水，我们不能辜负南方人民的一片心意！”

说真的，看到这段话时，我非常感动。我感激这一段充满人文情怀的工程设计，感激北京水务工作者和工程设计者赋予了冷漠的钢筋水泥以温暖的人性。

大地

甲子新中国

商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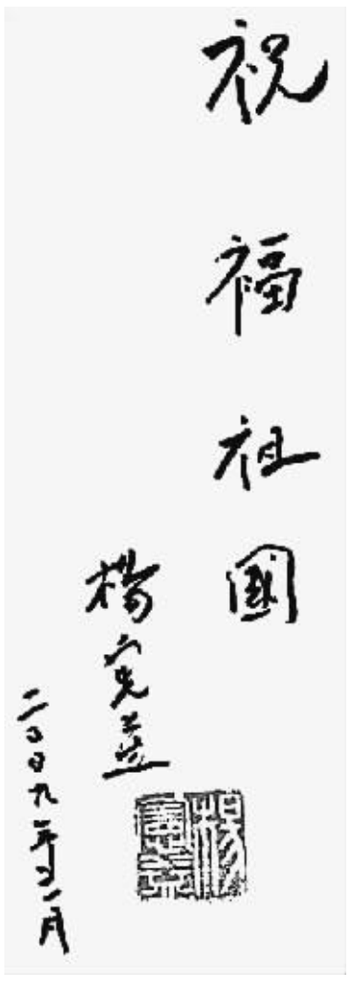
六十年是一甲子
这是又一个开始
又一个新生
在我们古老的中国

六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
几乎就是一世一生
对于我们的共和国，她正年轻
我们的共和国
诞生在六十年前
催生她的是隆隆的炮声
战马的嘶鸣
是无数的血和火为她助产
她诞生在黎明
为了她的出生
多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
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
这些英灵的一生
最后凝成了一句话
或者一串血
他们走上了绞架的绳索
走向一片青青的草地
那草地上闪动的露珠
是他们醒着的眼睛
他们想着明天的新中国
她的可爱
没有了剥削，没有了压迫
到处是鲜花
到处是欢快的歌声

我的马不停蹄的共和国
我的走在路上的共和国
坚实、宽厚、壮阔，走向创造
走向自信的共和国
我们走向第六十个十月
这时的共和国
土地上是富裕和鲜花
是歌声流淌的人群和村落
走向第六十个十月的共和国
我们的船队走向了南极
在那里看企鹅的婆娑
在冰雪中游弋
我们的飞船走向了太空
在那里，来自黄土地的嫦娥
不再寂寞
走向第六十个十月的共和国
不同肤色的民族齐聚鸟巢
有朋自远方来的共和国
变得包容、宽和
在地球的天空、海洋
倡导和谐
在金融危机的今天
信心比黄金更可贵
我们跳动着自强不息的脉搏

让我们来迎接她
把最好的词语
把我们最好的诗行
把我们丰收的稻谷
献给母亲般的祖国

清风清香（中国画） 鲁译元



翻译家、诗人杨宪益先生生于一九一四年，可谓世纪文化老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应邀写下『祝福祖国』几个字，其情可感。

父亲的声音

李书程

风徐徐地吹
穿过千万个乡村与城市的夜色
电话那端　就飘来了父亲的声音
平淡质朴的言语　温暖的问询
滋生我更多淳朴的挚爱情怀
亲情和爱生出的翅膀
携着油菜花和麦子的清香
涤荡我在异乡的疲惫与匆忙

科技发达的时代真好啊
省却了许多书信和无端的忧伤
父亲在电话里说
村里的商品房动工了
街道拓宽水泥路面加厚了
院子里移栽的花树早就发芽了
油菜种要结籽了　麦子也抽穗了
庄稼长势很好
今年会有好收成……
在父亲的喜悦里
我感受着家的味道和小小的幸福

我明白　父亲
美丽来自沧桑岁月的勤劳与执着
无论在家乡或是异地
我仿佛仍和您并肩坐着聊天

我和您一样　爱着生活
也深爱自己的儿子
坚定着真实与梦想的延续
我们都在默默努力付出着
数着汗水脚印追逐美好的生活
遵循着时间的秩序和规律
就像等待收割大地上的作物
精心翻耕、播种、浇水、施肥
不存半点侥幸　也马虎不得

此刻　我们紧握电话
就像憨厚的大地用植物的根
　抱紧自己
就像一棵作物的必然长势
用自己坚韧的方式
爱着现实和梦幻般的未来
爱着生命中的每一个春暖
花开和秋收冬藏

不断延伸的邮路

聂鑫森

我从青春年少，便开始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眨眼间已进入花甲老境。也许是性格使然，日常生活中总不想麻烦人，图的是个利索。但有一件事，却不得不劳驾邮递员。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有从外地寄来的信件、刊物、书籍，而且量还大。尽管我不知道这些不断替换的邮递员姓甚名谁，但我却知道这条邮路是怎么由短而长地延伸！

我原先供职的株洲木材厂，处在这座城市的最南端，再往前走就是郊区的地界。厂门正对着湘江，厂后是家属区；往里走，是一个很大的称之为“南湖塘”的泱泱湖塘，湖塘边横陈着郊区农民的菜畦瓜架；再深入进去，是“王塔冲”，有山有谷有崖有溪，树木丛生，云缠雾绕，隐约可见几栋散居的农家土砖瓦屋，很冷清也很荒僻。

成家前，我住的是厂区内的单人宿舍；1977年成家后，因家属区暂无住房，与十几户人家一道，还是住在厂区内一栋由办公楼改成的住宅楼里，一家只一间。

株洲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邮路的分布往往与沿途的工厂有关。以市中心的邮局为起点，以木材厂为终点，便是其中的一条邮路。邮递员每日上午和下午，各送一次邮件到厂传达室。我会在下班后，到传达室去取回属于我的邮件。1978年秋，我调到离厂不太远的《株洲日报》，但“家”仍安在这里，朋友们所寄邮件写的仍是这个地址，于是，到传达室取邮件的任务，便由内人承担了。

1983年，孩子一岁多了，我们搬进了厂后的家属区，拥有了一套小居室。没事时，我可以到南湖塘边散步，可以去闻闻瓜菜的清香。有意思的是，这片家属区因新建了几座宿舍楼，居住人口增加了，便设了一个投递点。凡是寄“株洲木材厂家属区”的邮件，邮递员都会送到这里的值班室来。粗粗一算，这条邮路从厂门口到家属区，延长了五六百米！

在此后的两个年头里，开进了一支又一支的基建队伍，菜地平复了，南湖塘填充了，呼啦啦崛起了几十栋商品住宅楼。1985年，报社在14栋的中门，买下一个单元12套房子，我也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和先前比，真是“鸟枪换炮”了。但我最关心的，是这个名叫“南湖塘住宅区”的邮件投递。因为我家离木材厂的家属区，已经很远了。

邮局的同志早想好了，紧挨着这片住宅区，新设了一个“南湖塘邮政所”。邮件用汽车从总局运来后，再由邮递员步行投送到各家各户的邮箱里，又快捷又稳当。这条邮路，追随着岁月的步伐，又向前延伸了好几百米！

株洲的发展，真是太快了。基建队伍又开始向王塔冲挺进，“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开山炸崖，平谷修路，建起了一座一座的大厦，组成了一个一个的住宅区，依山傍水，树绿花香，不少人家都搬到这里来了。

2003年夏，我们购买了康和山庄一套160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后，在春节前高高兴兴地搬进去了。不但有了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还有了很宽敞的书房画室。这里距南湖塘，又有了千把米的距离，绿色的邮路几乎是如影随形，也延伸了过来。当然邮路有了变异，是从株洲火车站的邮件分拣处出发的，然后径直扑进了王塔冲。康和山庄有传达室，邮件投递到这里就算完成了任务。跑这条邮路的，是一位骑着女式电动车的中年女同志。她知道我的邮件多，特意和我取得了联系，让我在一楼的杂物间外挂一个邮箱，这样可以万无一失。每年10月，邮局开始征订报纸、杂志。她见我年纪大了，去邮局不方便，亲自上楼登门叩访，让我填写订单，代我去交款。

30年来，不断延伸的邮路，象征着流光溢彩的生活场景，以及蒸蒸日上的邮政事业，在不断地拓展和升华，城市是这样，乡村亦如此。

我赞美绿色的邮路，赞美春天的信使——邮递员！

1949 2009 放歌60年 人民日报社 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
征文专版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daily.com.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901、65368903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59、65368760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0.9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 昨日本报（北京）开印：3时20分 印完：5时40分